

五凉经验对中国边疆治理的启示

徐兆寿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其中,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 而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目前, 西藏、新疆以及内蒙古的边疆治理在我国可谓重中之重, 而就西北来讲, 河西走廊的治理又是历史之重。因此, 研究五凉时期河西走廊的边疆治理经验对我国的边疆治理大有裨益。通过细致梳理五凉时期河西地区历代统治者的边疆治理经验, 总结出初级治理、中级治理和高级治理的治理之道, 发现以文化建设为核心思想的高级治理之道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相吻合, 尤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路径一脉相承。

[关键词] 五凉经验; 中国边疆治理; 启示

[中图分类号] K 238; D 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22)06-0192-12

[DOI] 10.16783/j.cnki.nwnus.2022.06.019

边疆治理在今天的重要程度毋庸置疑, 但如何治理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且古今中外有很多经验可供借鉴。就目前来讲, 西藏、新疆以及内蒙古的边疆治理在我国可谓重中之重, 而就西北来讲, 河西走廊的治理又是历史之重。从汉以来, 河西走廊地区原本属于西域, 而经过两汉、魏晋及“五凉”时代的治理, 该地区得以长治久安。从后世来看, 河西地区的安宁可谓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在西北方的政治屏障。近年来, 国家对祁连山的生态治理也上升到国家生态屏障的高度, 可见, 研究河西走廊的边疆治理经验对今天国家治理西北边疆大有裨益。笔者在对丝绸之路和河西走廊文化长达十多年的研究中, 认为“五凉”时代的边疆治理最值得借鉴。

历史上所谓“五凉”, 是指十六国时期以“凉”为国号的五个政权, 即由汉族人张轨所建的前凉(公元301—376年)、由氐人吕氏所建的后凉(公元386—403年)、由鲜卑拓跋氏(又称秃发氏)所建的南凉(公元397—414年), 以及由汉族李氏所建的西凉(公元400—421年)和匈奴沮渠氏所建立的北凉(公元397—439年)。这五个政权的活动

范围包含河西走廊、新疆的南疆地区、青海河湟地区和内蒙古的额济纳旗等地。后世学者将五凉时代常常微缩为河西走廊, 把河西走廊作为边疆, 这就造成了河西走廊与西域的断裂。其次, 在边疆治理的案例中, 学界并没有关注河西走廊的治理, 尤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农业和水利等方面, 这导致人们形成了刻板印象, 认为河西走廊自古就是荒漠, 是贫穷、落后的象征。事实上, 在五凉时期, 该地区不仅在政治上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发展, 在经济上出现了“凉州畜牧甲天下”的繁荣景象, 而且在文化上大力建设, 尤其在儒家文化的“兴灭继绝”方面颇有建树, 为隋唐盛世的形成提供了文明的基础。^①

总结这些经验,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历史, 而且可以清理出一些可供今天借鉴的边疆治理经验。

一、五凉先声: 窦融治凉经验

欲说五凉, 必要从更远的窦融治凉开始, 因为没有窦融在物质生产等方面的开拓与奠定, 就没有“五凉”时代的文化繁荣。

[收稿日期] 2022-08-25

[基金项目] 甘肃省教育厅教育揭榜挂帅项目“敦煌与河西走廊影视传播与产业转化研究”(2021jyjbgs-07)

[作者简介] 徐兆寿(1968—), 男, 甘肃武威人, 文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与传播研究

公元23年（更始元年），窦融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史料载：“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1]（《窦融传》，P796）这里的“虏”当指匈奴，具体指卢水胡。由于卢水胡与羌人长期在卢水流域共存，故史书又往往统称他们为“卢水羌胡”或“属国羌胡”。^[2]（P90）窦融到任后不久，由于内地局势动荡，西北边塞的民族关系变得复杂化，“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1]（《窦融传》，P797）值此之际，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五郡联合，“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1]（《窦融传》，P797）全权负责河西五郡。窦融之所以能够担此重任，与其“世任河西为吏，人所敬向”^[1]（《窦融传》，P797）有很大关系。

窦融的高祖父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曾为护羌校尉，从弟为武威郡太守。因其家族累世在河西，故知其土俗，熟其世俗。另外，窦融以其张掖属国都尉之职，掌握精兵万骑，这可以作为安定河西的军事保障和基础。窦融去河西上任前说道：“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2]在河西，窦融不仅颇得民心，且善于处理民族关系。这说明他不仅具有谋略，还有治理一方的能力，再加上祖上积德，足可以统治一方。

窦融治凉时期，专设“牧师苑”一职，发展牧业，“凉州畜牧甲天下”的局面由此形成，并一直延续至宋代。凉州地区最早属于游牧文明，尤其在汉武帝建四郡^③之前，游牧文明占据主导地位，游牧民族在这里厮杀攻伐，实力此消彼长，土地不断易手。汉武帝利用政治势力予以干预后，汉朝主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里得以逐步推广，及至普及，所以窦融又顺势把中原一带先进的农耕技术及相关文明带到河西，尤其是儒家礼仪文明，影响最为深远。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窦融对河西地区的治理为五凉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五凉文明的先声，甚至可以说，没有窦融就无法形成五凉时期河西地区稳定、繁荣的局面。总体来讲，五凉前窦融洽凉经验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融洽疆，安定胡羌。窦融，字周公，起于王莽新朝，后又在更始之际入河西，最后在汉光武帝时立世，历经数世，在混乱中能立足并发展，全凭其谋略、胸怀与德行。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一个人的名字对其有暗示作用，窦融的名“融”，在后世便显示出他对各少数民族的融合，而其字“周公”，可见其德行一直是向周公靠拢。他在世七十八年，因卓越世功而为自保数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可见他知进退，所以虽有从子等犯罪，但终究没有什么大错。到他死时，族人基本平安且享有继承权，这都说明他有智慧和德行。

早在新莽、更始之际，社会动荡，窦融到河西为大将军，其时，卢芳、彭宠勾结匈奴，骚扰边境，周边少数政权蠢蠢欲动，而西汉后期，一直蛰伏的羌人也蠢蠢欲动，准备伺机发动进攻。《后汉书》记载：“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河西地区“斗绝在羌胡中”，^[1]（《窦融传》，P804，P797）由此可见，西北边塞防备羌胡的军事压力增大。在此背景下，窦融登上了治理河西的历史舞台。他主持修筑防御工事，利用烽燧告急的方法，一旦发现羌胡侵扰，便集结五郡之兵共同抵御，确保河西内部的安定，如史料记载：“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怨义，稀复侵寇。”^[1]（《窦融传》，P797）窦融面对不断来犯的少数民族，采取“怀辑”政策，“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1]（《窦融传》，P797）既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又促进了河西的民族融合，是为适宜的民族政策和治理之道。

总之，窦融采取中庸之道，利用包容和合的政策，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融合到一起，使得河西有了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他居安思危、刚柔并济，实行的是比较理性的民族政策，尤其在“怀辑羌胡”方面卓有成效。在羌、胡进逼，河西并未在中原政权保护的情况下，他还能将五郡治理出“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1]（《窦融传》，P799）的盛况，其治疆能力的确很突出。窦融以兵家之实力镇守张掖郡这一关口，使得河西归于安宁。尤其面对重新强盛起来的匈奴，窦融没有投降，而是稳固民心、加强建设、积极防御、不屈不挠，不仅保持了民族尊严，更是保卫了河西领土，抵制了匈奴的野心。这也是河西的牧业取得较大发展的一个保障。

（二）以宽安民，稳定民心。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动荡不安，河西地区民心稳定、秩序井然，这得益于窦融宽和的治理政策。史料记载：“融居属国，领都尉职如故，置从事监察五郡。河西民俗质朴，

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宴然富殖。”^[1]（《窦融传》，P797）此外，于1974年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三枚汉简记载了当时属国的秦胡、卢水胡的士兵贫困潦倒，流亡至河西地区，甚至还被河西当地官吏役使，为其放牧和耕作。这引发了一系列民族冲突和矛盾，对此，窦融颁布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胡土民的法令，禁止吏民役使、藏匿这些少数民族，发现要及时报告给上级，这些政策保障了属国中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使得民心归之。史料载：“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1]（《窦融传》，P797）可见，河西周边的安定、北地、上郡的流民为避荒年饥饿，也因为窦融的宽民、安民政策愿意归附到河西。

（三）建立特区，牧业富民。河西地区早在遥远的过去，就是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祁连山上的雪水使其北麓成为冲积平原，而其南麓则是放牧的高山草甸。羌人在此放羊，月氏人、乌逊人以及匈奴人都在这里牧马。后匈奴人赶走了月氏人，在河西一带驻扎。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河西之地皆属于西域，而祁连山以南之地，属于羌人之地。武帝时，驱逐匈奴并开通河西五郡时，匈奴人一首民谣可形容这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④可见，匈奴人是多么地眷恋这片草场。相比于整个北方的草场，其他地方都要不停地迁徙，但河西之地似乎可以久居，因为这里有充足的雪水。这也是河西后来可以变为农耕之地的原因。

河西五郡设置后，汉朝大量移民，使得汉民与西北游牧民族混居，因土地开垦较少，故而牧业仍然是主业。到窦融治理河西之时，河西地区虽时有战争，但在汉朝的治理下也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了相当的基础。窦融在大将军府专门设置了“牧师苑”，负责畜牧事务，发展五郡畜牧业；同时又颁布了禁杀马牛的政令，以此保护役畜；此外，他还颁布了禁止砍伐树木的政令，使得河西之地的风沙得以缓解。《汉书》上说：“自武威以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3]（《地理志》，P307）这一治理成果也反映在窦融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前往洛阳觐见光武帝时所驱赶“马牛羊被野”的盛况中。

“牧师苑”制度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促进了马、牛、羊等牲畜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增加了社会财富和军事实力；其次，这一制度发挥了凉州的自然优势，保证它能以

牧为主，促进半农半牧的经济发展，从而抑制了国民经济重农轻牧的倾向；第三，有利于巩固中央政府对边郡的统治，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经济往来。这一制度也为后世诸皇朝所效仿。直到清代前期，朝廷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肃州花海子一带带湖等地设立牧马监，有专门的马场，用以畜养马匹和其他牲畜。

（四）发展农业，文明西进。在牧业发展的同时，窦融也致力于河西内部农业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加强农业体制管理。窦融治理期间，在河西设置了屯田机构，汉简中有“农都尉”的记载，“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1]（《百官志》，P3621）“农都尉”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派专人担任部长，负责管理人民的农耕。这就使得当时的农耕事务被纳入一套管理体系内，让大家从事农业生产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序运行。2. 依靠军队。在无战事之时，军队也要从事农业劳作。3. 窦融引进西域和中原的一些农作物，利用原产地的种植技术和农耕工具，使其在河西育苗生长。4. 窦融当时带去了很多铁器，尤其是铁犁，提高了耕种效率。5. 他还引进中原地区的谷物储藏技术、食物烹饪技术等，使得河西地区较为落后的局面得以改善。

在窦融经营河西时期，进一步推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例如，姑臧城开辟了专门供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居民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每天开放四次之多，当时商贸交易的需求之大和市场繁荣可见一斑。

总之，窦融在河西治理中，秉持中庸之道，正确处理了民族关系，使得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各安其分，种田也好、养马也罢，大家相安无事，共同生存；窦融秉持一种宽容、和合、中庸的方式进行治理，将地方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相结合，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作出贡献，使得其治理时期成为河西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最后，当窦融离开河西时，他赶着数万头羊、马，漫山遍野、浩浩荡荡去了洛阳。如史料所载：“及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1]（《窦融传》，P807）“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陇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征召，财货连轂，弥竟川泽”；^[1]（《孔奋传》，P1098）“先是，帝闻河西完富，……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

内则百姓蒙福”。^[1]（《窦融传》，P799）由此可以感受到河西物产丰富，仓库有存粮，较为富裕。陈寅恪先生指出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迁徙之区。”^[4]（P29）

因此，从这一宝贵历史经验中可以借鉴和学习的边疆治理经验便是：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一保障，就难以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更是空中楼阁。

二、前凉：以礼治凉，安定边疆

前凉是十六国中享国最久的国家，从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至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悼王张天锡被迫投降前秦为止，共七十六年。前凉盛时疆域有今甘肃、新疆及内蒙古、青海各一部分。这要归功于张轨家族的成功治理。张轨（公元255—314年），字士彦，安定乌氏（今平凉西北）人。据《晋书》记载，张轨是西汉常山景王张耳的第十七代孙，其父张温曾任西晋太官令，家世孝廉，以儒学显。张轨自幼明敏好学，隐于宜阳女几山，是安定名士皇甫谧的门生。曾任太子舍人、征西军司。张轨家族治凉期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经验：

（一）礼容教化，道德先行。晋惠帝时（公元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到任后，他大筑姑臧城（今甘肃武威），任用当地有才干的人共同治理，课农桑，立学校，阻击入侵的鲜卑族，保境安民，抚定地方，安置流民，多所建树。《晋书》上说：“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郾、平狄、司监等县。”^[5]（《地理志》，P434）除此，他还分西平（今青海西宁）郡界置晋兴郡，以处流民。实际上，大批汉人流迁河西对于河西发展大有好处，一是他们为河西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二是为河西地区开发提供了大批劳动力。因此，张轨安抚流民的措施有利于河西发展。

永嘉之乱时，天下分崩，唯独张轨贡使不绝，秉持君臣之道。公元304年，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相继发动叛乱，互相大打出手，张轨曾经派兵三千，前往京师洛阳勤王救驾。张轨此举，忠心可见。公元311年，洛阳被汉赵大军围困，洛阳城中，各种物资极度匮乏，张轨又是派兵解围，又是送去马匹、布匹等物。晋怀帝十分感动，加封张轨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爵霸城侯，随

即又提升为车骑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此外，在天下大乱，西晋中央政权衰弱之际，一般地方官吏多与之断绝关系，而张轨仍然始终如一地臣服于西晋政权。史称：“于时天下既乱，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轨遣使贡献，岁时不替”。^[5]（《张轨传》，P2223）张轨临终前，叮嘱子孙不得称帝，其子孙张寔、张茂、张骏等几代统治者，也继续恪守其父祖辈张轨忠于晋室的政策，可见张轨的君臣之礼影响力之大。

自洛阳沦陷（公元311年）后，张轨对中原和关中地区流民予以安置。可见其秉持以礼待人、以礼处世的治理经验，体现其爱民之礼，这与张轨的家世有关。《晋书》中记载张轨是世家子弟，是西汉常山景王张耳的第十七代孙，属于王公贵族的后代。实际上，他从小和皇亲国戚们就有所往来，故而史书中用“颇有礼容”来形容他。“礼容”，意为儒雅端庄、肃穆大方，行为举止得体有礼。张轨因此获得很多人赏识和尊重。这也得益于他的老师皇甫谧所教。张轨以礼见长，符合儒家思想的规范。礼仪是儒家思想重要的形式追求，也是道德追求的表现。礼是形式，德是内容。

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后所辖地理范围已经超出了河西走廊，远至楼兰。据出土文书记载，张轨在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已将凉州势力扩展至楼兰。当时西晋朝廷已撤走了早先设置的西域长史，之后鄯善国一度统治楼兰。^[6]（PP. 167—169）则前凉应是驱逐了鄯善势力才得以入主楼兰，前凉扩展到楼兰后并未继续扩张，也未见与西域诸国接触的记载。《晋书》记载：“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5]（《张轨传》，P2237）由此可见，前凉至张骏时期才向西扩张，张骏重用西域长史李柏，经过两次征讨最终占领了高昌，并在其地推行郡县制，大大强化了前凉对西域新北道及今吐鲁番盆地一带的控制力度。此外，前凉在张骏时期还击败了鄯善和龟兹，不同的是，前凉击败鄯善后仍命鄯善王治理其国，并不如高昌郡一带久为中原政权所置戍已校尉统治，直接统治不存在太多障碍，而鄯善、龟兹二国并不适合这种做法，因此前凉仍假手土著国王进行间接统治。但前凉也在鄯善、龟兹驻兵，以威慑之。前凉在击败龟兹、鄯善之后，又设置沙州、攻伐焉耆，由此确立了前凉在西域的霸权地位。前凉

在接连击败龟兹、焉耆后，疏勒也遵循传统，款服于前凉，如此，前凉曾慑服葱岭以东、乌孙以南西域诸国。^[7]（P213）前凉较之西晋时期对西域的统治大大加强，对拓边西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文化西进，号为多士。比军事和政治建设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张轨对于文化的建设。张轨以儒学传家，深知儒家思想对维系统治的作用。因此，张轨初到凉州，就大力兴办学校，提倡儒学。据《晋书》所载，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5]（《张轨传》，P2222）张轨还规定，崇文祭酒（官职名）的地位仅次于刺史。能给予一个主管教育的官员如此高的地位，这在晋末局势大乱、学校制度废弛之际，是十分难得的。这项举措也足见张轨对振兴教育和传承文化的决心之大。

此外，张轨还提倡私学，鼓励文人学士著书立说。他大力扶持教育事业，积极推动文化发展，因此吸引了大批中原地区的学者纷纷避地凉州，其中不乏郭荷、宋纤、宋繇、刘衍等儒家宗师。张轨对儒学的推崇，很好地促进了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域的传播，并且凉州因为文人广布，这里还保留了大量中原失传的经籍。这一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张轨治理凉州十三年，将这一地区建设成为了中国北部的一个文化中心。张轨敦崇儒学、振兴教育的态度，也影响了自己的子孙。他的儿子张茂延续了张轨文治兴邦的政策，并使其有进一步的发展。及至其孙子张骏时，前凉的学校教育体制和儒家文化教育已经相当完备，并增设国子学，“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8]（《前凉录》，P819）专门负责州郡儒学的教学工作。

前凉张氏一族的崇学态度，不但在自己统治范围内树立了典范，还对日后的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诸政权的文教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的胡族统治者沮渠氏、乞伏氏、秃发氏，都以崇尚儒学为风尚。甚至到了日后的北魏，长于凉州的鲜卑人程骏，也以在宫廷中给拓跋皇室讲述儒学为荣。

（三）劝课农桑，农业变世。张轨及张氏家族治理凉州时期，农业的发展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的大量流入，令河西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有了保障，尤其是大量的中原人民移入凉州，是推动生产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张轨初为凉州刺史时，他曾上表晋廷：“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5]（《地理志》，P434）其后，到张寔统

治时，南阳王司马保败亡后，“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5]（《张轨传》，P2230）这是秦陇人民两次大规模移入河西的记载。另一方面，张轨及其后统治者劝课农桑、不夺农时，减轻赋税徭役，命令新迁之民垦荒造田、牧养牲畜。张轨死后，张茂统治时期，打算在姑臧建灵钧台，“基高九仞”，需用大量劳力，民怨四起，说他“劳百姓而筑台”，“实非士女所望”。^[5]（《张茂传》，P2231）张茂听后，能够接受意见，罢黜百姓之劳役，没有强行占用百姓农耕时间。到了张骏、张重华执政时，也实施了一系列安民政策，发展农业，如张骏刚继位，他就“亲耕藉田”，用以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张重华则“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5]（《张重华传》，P2240）

从张轨开始，前凉还重视兴修水利，有沙州刺史杨宣在州南十里修建的长15里的阳开渠，州东十五里修建的长45里的北府渠；敦煌太守阴澹在州西南修建的阴安渠，其中以北府渠工程最为坚固。这些渠都引甘泉（党河）水灌溉，使“百姓蒙赖”。前凉发展农耕经济的措施被其他四凉政权继承。

（四）文教定疆，功在千秋。事实上，张轨到任之时，中原地区的封建文化和教育制度由于动荡局势遭到严重破坏。而张轨深知儒家思想对维系封建政治所起的作用，他要在凉州以儒家思想进行教化，培养人才，建立稳固的封建秩序。他在任期间，以教化人民为主，鼓励并提倡人们多读书，史书载：“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5]（《张轨传》，P2222）张轨创办学校，推动了凉州文教事业的发展，将中原失传的一些经籍学说保存下来。所以《魏书》说：“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9]（《胡叟传》，P1150）

张轨积极推动凉州文化由游牧文明进一步向耕读文明转变，促使儒家思想和农耕生活方式在河西走廊生根发芽。此外，在民族关系方面，张轨并没有采用镇压游牧民族的极端方式，而是采取兼容并包的治理策略，在凉州地区繁盛的游牧文明基础之上，借助西域佛教文明的传入，造就了凉州文化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征和格局，即多元包容，以儒家思想为本，推崇礼仪，安民安邦。实际上，自周公创立礼制而使周朝有了八百年基业之后，其他很多朝代因为放弃了礼制而并不持久。张轨明白儒家思想和礼仪的重要性，身体力行，怀揣圣人之心，乐

于奉献，并将这种思想推及民间，用这种思想治理凉州。在张轨的治理下，凉州逐渐兴旺发达。一个“文化”凉州终于慢慢形成了。他敦崇儒学、振兴发展教育的举措，不仅为其后世尊儒倡学树立了榜样，而且对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诸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产生了长远影响。

张轨之后，凉州一直是当时中国北部较为安定的地区，也是中国北部保存汉族传统文化多且完整、接受西域文化最早的一个重要地区。在前凉的有效治理下，凉州逐步形成农业和牧业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文教昌盛，从此人心归汉，边疆得安，使河西走廊从西域世界脱离出来，成为中原文明的一个有机分支，而其以西之地则始终处于变动不居之状，盖因文明未到耳。

三、后凉：中西融合，文化多元

十六国时期略阳（今甘肃平凉庄浪县）氐族人吕光建立了后凉王朝。氐族在五胡十六国纷争时期最为活跃，其历史悠久，先后建立了两个政权，即前秦和后凉。前秦，略阳氏人苻坚所建；后凉，略阳氏人吕光所建。吕光出生于行军队伍之中，自幼随父亲征战，史载其“不乐读书”，好为“战阵之法”。^[5]（《吕光载记》，P3053）吕光身高一米八三，是一员骁将，他四处征讨，频获战功，苻坚拜他为骁骑将军，十分器重他。

公元382年，苻坚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之后，想要继续征战西域，于是授吕光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总兵七万、铁骑五千征讨西域。公元384年前秦瓦解，中原陷入纷争之时，吕光却在西域所向披靡，他击败了龟兹国和西域各国的救兵七十余万，名震西域。西域三十余国都归附吕光。苻坚听说吕光获胜，遣使策命他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留守西域。

公元385年，吕光满载而归，他不仅带着两万匹骆驼、一万多匹西域骏马和一千多种珍奇的西域货物，还有此次最重要的目的——带鸠摩罗什高僧东归。公元386年，吕光杀凉州刺史梁熙，进据姑臧城。在这之前，即公元385年，苻坚已为后秦姚兴所杀。吕光再无后患，便“三军缟素”，为苻坚发表，然后署置百官，自领凉州牧、自爵酒泉公，以姑臧为都，建立了后凉，年号太安。^[10]

吕光远征西域的胜利，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方面在西域诸国传播了中原文化，另一方面为中原地

区迎来佛教高僧鸠摩罗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作用。他建立后凉后，把氐族人民引入了河西民族的融合进程中，加速了氐族社会的瓦解。

后凉疆域一般指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疆地区。广义上来说，西域还包括新疆以西，中亚细亚的广大范围。随着历史的发展，西域诸国既有大国对小国的兼并，也有一些国家不断分化，所以西域大大小小的国家并不是同时存在的。到十六国后期，吕光西征时，一般小国已不存在，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国了。后凉充分吸收融合了这些西域文化，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格局。

当时征讨的西域大国之一是焉耆国^⑤（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东汉时人口已达五万二千。吕光大军到来之前，焉耆国王泥流见吕光阵势浩大，恐惧之下主动联络了一些小国王投降了吕光。因此，焉耆国当时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得以较好地保留下来。当时另外一个西域大国是龟兹国^⑥（今新疆库车县），东汉时人口达八万多，是西域诸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龟兹王室姓帛，面对吕光大军，龟兹国王帛纯一开始采取抵抗策略，但鏖战半年后，被吕光大军打败，龟兹国王弃城逃跑，吕光带回了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后来他为佛教在中国的东传和佛经翻译付出了汗马功劳。丰富多彩的西域文化（如佛教石窟文化、龟兹乐舞文化、龟兹冶铁文化等）为后凉多元文化、中西融合的统治局面奠定了有力基础。

由此可见，五凉各个政权与其周边的西域各族的关系如何，事关河西地区的安定。总结历史经验，不难发现，五凉诸政府在政权稳定后，大都采取和辑各族的政策。对于称臣纳贡的西域各族，都给予安抚，以建立友好关系为外交政策。如张轨建立前凉后，对西域各族进行安抚，西域各族纷纷归附，都向其称臣纳贡。后凉吕光占据龟兹城后，“抚宁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5]（《吕光载记》，P3055）南凉拓跋氏，一贯奉行“修邻好”政策。拓跋乌孤败吕光后，岭南羌胡数万落皆来归附。西凉时期，也有壁画记载，如酒泉、嘉峪关墓壁中有一部分人穿着少数民族服饰，留有少数民族发式，高鼻深目，具有西域民族的特征，他们能够与汉族人友好往来。这些都反映出五凉时期民族关系的和睦融洽。^[11]

四、南凉：以儒化胡，文明以止

南凉于公元397年由河西鲜卑族拓跋乌孤所

建，其政权范围主要在青海一带，以游牧民族为主。南凉盛时控有今甘肃西部和宁夏一部分地区。汉魏之际，拓跋氏的一支由酋长统率，从塞北迁到河西，被称为河西鲜卑。在此居住约两个世纪，部众渐盛，务农桑，修邻好，境内安定。至拓跋乌孤时期，以廉川堡（今青海民和西北）为中心，势力不断发展，初附于后凉吕光。

史书记载，拓跋乌孤胸怀大志、勇武雄健。他和大将纷陀商议如何夺取凉州。纷陀说：您如果一定要夺取凉州，就应该首先提倡并实际推广农耕，讲习武事，再礼贤下士，治理纲政与刑法，然后方可以采取行动。拓跋乌孤能够听得谏言，便致力于发展农业和桑蚕业，并与邻邦诸国修好。^[5]（《秃发乌孤载记》，P3141）但即使这样，在南凉立国初期，拓跋部虽已进入农耕生活，却并未彻底摆脱游牧习气和部落遗风。到了拓跋利鹿孤执政时期，关于如何兴邦治国的问题，鲜卑人和汉族官僚分歧很大。汉族官僚要求建立一个封建王朝式的有序朝廷，而鲜卑官僚则要在马背上治天下，主张不设国都，不置府库，让汉人提供兵食，鲜卑则“专征为务”。史书载俞允仑言：“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貽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5]（《秃发利鹿孤载记》，P3145）这个意见刚开始被利鹿孤接受并实施。利鹿孤一次次出兵掳掠胡汉人口充入河湟。史料记载：建和元年（公元400年），掳掠姑臧城外八千户居民。次年，又掠徙姑臧民两千余户而归。三年，“徙显美、骊鞬二千余户而归”，又“徙凉泽、段冢五百余家而归”。^[5]（《秃发利鹿孤载记》，P3147）如此下去不是办法，利鹿孤也感到单靠军事并不能长久治国，于是在建和二年（公元401年）提出要臣僚检讨政治。祠部郎中史嵩直言极谏，建议革除野蛮，实行文治，并献策从改良选举和振兴教育入手，以推进政治进步。史嵩说：“古之王者，行师以全军为上，破国次之，拯溺救焚，东征西怨。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

子。”^[5]（《秃发利鹿孤载记》，P3146）利鹿孤接受了史嵩建策开始兴办教育，以儒家思想规训臣民，并委派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负责教育事务。在利鹿孤的改革措施下，南凉政治呈现一定的文治气象。^[2]（P278）

此外，南凉开国之主拓跋乌孤尽管出身游牧民族，却善于任用学过五经的贤士治国，因此他治理期间，人才济济，且被他任命的很多都是陕西人和秦州人。拓跋乌孤善用经学贤士、儒学雅士等知识分子来治理河西走廊，才使得河西走廊有了后来的盛世。

事实上，河西地区儒学的发展与兴盛，有两个关键时期：一是汉武帝时期的移民开发，为河西地区首次输入了儒家文明。五凉儒学的发展，源于西汉中期儒学的西渐。汉武帝击败匈奴后，占据河西，设立河西四郡，并从内地迁徙大批民众及犯官、戍卒等，充实边境，这为河西带来了中原内地的儒家文明。尤其一些以经学传家的大族，由于汉朝开疆拓土或遭遇贬官等各种原因，西徙河西。这些名门大族在之后河西历史上都发展为久盛不衰的门阀望族，他们大多以经学传家，保存了汉族的儒家文明。二是西晋末年的流民入凉，营造了五凉时期儒学的空前盛况。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凉州刺史张轨建立前凉政权。当时，中原地区兵革不息、纷乱不已，而河西则相对而言较为安定，许多中原民众纷纷流入河西。史载：“永嘉之乱，中州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12]（P3877）这次流民浪潮给河西地区再次输入了中原的儒家文明，使五凉时期的河西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河西儒学呈现出空前繁盛。^[13]

五、西凉：耕读西进，儒化边疆

公元400年，李暠从敦煌效谷令升为大都督、护羌校尉，据守敦煌，封官建制，使敦煌成为地方政权。公元405年，他迁都酒泉，逼近北凉，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建立了西凉王朝。西凉以敦煌（后迁至酒泉）为都城，疆域广及西域，主要覆盖今甘肃西部及新疆哈密小部分地区。

李暠是李广后裔，李姓世代为凉州大族。李暠性格沉稳，有器度，广泛涉猎经书、史籍，尤其擅长文章、词赋，喜爱兵法、习武艺，可谓文武双全。《晋书》载：“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

也。……世为西州右姓。”^[5]（《凉武昭王李玄盛列传》，P2257）李广曾经主政陇西郡，骁勇善战，军望颇高。李暠有祖业在凉州，他治理期间，受到当地百姓拥护，也得益于祖德荫庇。

在军事上，李暠不惧压力，积极应对外部威胁，能够在权衡利弊之后，依然采取以和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史载：“先王遗令‘深慎兵战、保境宁民、俟时而动’”。^[9]（《李暠传》，P2202）为了防备北边柔然、南边之吐谷浑的军事威胁，“玄盛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5]（《凉武昭王李玄盛列传》，P2265）由于西凉政权在军事力量上相较于北凉、南凉较为薄弱，又面临北凉沮渠蒙逊的军事压力，所以李暠主要以守为主，以和为先，尽量避其锋芒，不以卵击石。^[14]

西凉对于今新疆地区的统治，在文化渗透和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精力，致力于其稳定和发展。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李暠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5]（《凉武昭王李玄盛列传》，P2259）所谓玉门以西诸城，实指伊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哈密地区）所辖诸城。李暠据高昌时，“玄盛亲率骑二万，略地至于建东，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5]（《凉武昭王李玄盛列传》，P2263）可见李暠亲自率兵至建康东时，鄯善、前部二王进贡方物。西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还可以从李暠第二次遣使向晋通诚的表中得知：“今资储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众，冀凭国威，席卷河陇，扬旌秦川”，“又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统摄昆裔，辑宁殊方”。^[5]（《凉武昭王李玄盛列传》，P2264）以上都反映出西凉与西域经常来往的关系。李暠去世后，其子李歆仍然控制着高昌，西凉与高昌间照常有往来。^[15]其次，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来看，西凉对高昌的文化影响深远。有学者认为西凉把在各郡设置五经博士的制度推广到了高昌郡，西凉还把县、乡、里的行政系统设在高昌。^[16]（P88）

在政治上，李暠团结士人大族，尤其以敦煌大姓为主，尚仁崇礼，知人善任，执法宽简，赏罚有信。在外交上，李暠和好于东晋。他接受了东晋的封号，设侨郡安置江淮和中州的流民，并交好南凉，对抗北凉。李暠虽割据一方，但从未称帝。这种外交政策符合当时河西世族和广大汉族百姓的愿

望，李暠为了争取广大汉族人士的支持，了解了河西汉人尊奉晋室的心理，便进一步表达自己对晋室的忠诚，获得民心。

在经济上，李暠发展农业生产，劝课农桑，鼓励稼穡，开垦土地，兴修水利，迁徙人口。他继承汉魏以来的屯田政策，把农业发展作为立国之本，利用从中原迁来的人口生产大军及其带来的先进技术，置郡筑城，“寓兵于农”。由于敦煌当时都是游牧民族，不愿耕田，地广人稀，李暠劝大家放马的同时耕种，传播了农耕文明，河西地区的生产方式得以改变。史料载：“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穡。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5]（《凉武昭王李玄盛列传》，P2264）另有墓葬考古壁画显示出西凉时期“一派和平生产的景象：农牧林桑兴旺发达，五谷丰登，坞壁园林相望。其中有屯垦放牧的场面，却没有战争的场面。”^[17]（P88）

在文化上，李暠大兴文教，培养儒士，积极传承、发扬中原文化。他启用很多文人做官，鼓励他们实行教化，建立学校，设置五经博士，传授经学，使得当时国运发达，如李暠“又立泮官，增高门学生五百人”，^[5]（《凉武昭王李玄盛列传》，P2259）他“通涉经史，尤善文义”。^[5]（《凉武昭王李玄盛列传》，P2257）李暠征辟敦煌人刘昉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9]（《刘昉传》，P1160）这些举措使得西凉成为十六国时期文化极为突出的一个政权。

六、北凉：引进佛学，儒佛相融

北凉是由匈奴支系卢水胡族的沮渠蒙逊所建立。沮渠蒙逊少年时期喜爱阅读史书，他才智出众，有雄才大略，善于权变。北凉政权先都张掖，后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北凉王沮渠蒙逊崇重儒学，将酒泉、敦煌的学者悉数迁到张掖，如刘昉、索敞、阴兴等西凉著名的儒学学者都被迁徙至北凉国都张掖。沮渠蒙逊还修建了一座陆沉观，“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9]（《刘昉传》，P1160）北凉最强盛的时候控制甘肃西部、宁夏、新疆、青海的一部分，成为河西一带最强大的势力。

北凉时期，佛教兴盛，影响力大，直接影响了北魏。沮渠蒙逊尊崇佛教，推动北凉的译经造像活动，在他的倡导下，凉州佛教发展出现高峰。据中

国佛教史的记载，北凉高僧昙曜扮演了重要角色。史书载：昙曜“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17]（《昙曜传》，P12）他在北凉时期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曾为当时“太傅张潭伏膺师礼”，受到北凉统治者的尊重，由他主持开凿了天梯山石窟。在北魏太武帝灭掉北凉之后，随着“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9]（《释老志》，P3032）的变化，北凉佛教逐渐衰微而北魏佛教却因此兴盛起来。昙曜还是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开凿的推动、组织、经营者。因此，北凉时期，统治者重视佛教，对佛教极为尊崇，大开译场，广译佛经，同时建造佛寺，开窟造像，雕造石塔，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时期。故而北凉治理经验呈现引进佛教，儒佛相融的局面。

两汉之交时，佛教就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东传，途经中亚、西域，再入河西走廊，最后抵至中原，传播开来。整个五凉时期，统治者在尊崇儒学的同时，大都大力发展佛教。《魏书》云：“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9]（《释老志》，P3032）由此可见，从前凉至北凉，五凉时期的佛教一直得到发展，塔寺林立。宗教文化，尤其是以佛教为主的文化交流，是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五凉政权最为突出的文化交流内容。当时佛教东渐而道教西传，五凉时期，大批印度、西域的高僧，途径丝绸之路，来到河西，译经传教。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月氏人支施仑、龟兹王子帛延、龟兹人鸠摩罗什等；同时，河西的僧人络绎不绝，西行求法，参与译经活动，这一过程中，自然带去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两种不同民族的宗教思想、文化传统在河西汇合，并经历了本地化的改造，发展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这种中西交流的规模、意义和影响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外，五凉时期河西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五凉统治之地，河西走廊一带水土条件较好，河西走廊有着丰富的水利资源，祁连山终年积雪，夏日消融，给农田灌溉提供了条件。走廊内河道纵横，著名的氐置水（今敦煌党河）、籍端水（今安西、敦煌间疏勒河）、呼蚕水（今酒泉北大河）、羌谷水（今张掖黑河）、谷水（今武威、民勤间石羊河）等五条河流交错回流，加上走廊地势平坦，引水灌溉方便。其他如敦煌、高昌、吐鲁

番等地大多是戈壁、沙漠地带，水源成为突出的限制发展的问题。^[11]

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的八件十六国文书，内容涉及水利、税收、狱讼、管制等各个方面。其中功曹改动行水官文书就有三件。“铠曹参军王夸，均役主簿候乾，校曹书佑隗季，掾史曹严午兴，县吏一人，右五人知行。中部葡萄水，使竞。金曹参军张兴周……校曹书佑黄达，功曹史翟庆，县吏一人……今引水溉西部葡萄，谨条任行水官名在名，事诺约敕奉行。”^[11]其中可见，北凉为开发吐鲁番地区曾设置了许多行水官，他们都是从右曹官吏中临时抽调来的，由功曹“条任”和“改动”，其职责主要是分配浇灌用水和维修水利设施。文书中提到的铠曹参军、校曹书佑、功曹史等官职早在曹魏时期就已设立，北凉沿袭内地政制，为发展河西地区农牧林桑事业，专门设置这些机构，充分反映了政府对于水利事业的重视。

七、五凉经验对新时代边疆治理的启示

总体来讲，五凉经验对中国边疆治理的启示总结起来有三：一是严宽结合，胡汉相融，安定边疆，此为初级治理。这是窦融治疆的一个经验。它奠定了“凉州畜牧甲天下”的繁荣局面，使人民安居乐业。二是农耕引进，使民安富，安定身心，此为中级治理。这也是窦融时期就开始的方法，到五凉时期，张轨等进一步加强农业建设，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改变五凉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仅使人民富庶，而且将农耕文明的基本规律和形式带入五凉地区。这是行为方式的改变。三是文明以入，教化四方，信仰安民，此为高级治理。这是从张轨开始的五凉时代普遍进行的建设。儒家的礼教、学校、道教的方法、官制、日常生活的礼仪与传统都从中原引入五凉地区，使五凉地区在文化上与中原连为一片，可谓心有定焉。

高级治理是建立在初级治理和中级治理的基础之上，从初级治理到高级治理，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只有夯实了初级治理（重物质文明的发展）和中级治理（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文明的初步融合），才能发展和促进高级治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由此可见，唯有从文化和文明层面“教化四方”、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共识和整体意识的高级治理才是治理的最终目标。

从河西地区的历史来看，正是因为文化上与中原连为一片，所以自然就从西域世界中最先分离

了出来。也是因为文化上的大一统格局，所以在五凉时期和唐代的动乱中，前凉政权与张仪潮集团才会心向中原，首先使河西走廊回归大一统的政体，然后又促使西部边疆得以治理。更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后世的历次动乱时期，河西走廊在西北地区和国家的统一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今天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看来，是因为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使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这只是一个基础的原因，更为重要的则是文化上的治理，这才是更长远、更深沉的影响。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回看新疆、西藏、内蒙古和其他地区的连续治理，就会发现文化上的“二心”是造成连续动荡的主要原因。故而我们说，五凉经验在中国的边疆治理中是最为重要的经验。

我国的边疆治理已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在王朝国家时代，国家疆域一直处于有疆无界的状态，虽然“有疆无界”，但统治者对边疆区域的关注却不敢松懈。不断将中原的文化制度向边疆渗透，对其进行文化建设是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治理策略之一。这样一来，就使得边疆的公共生活有更多的中原文化特征，如五凉时期，中原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地区扎根，尤其前凉时期的“文化西进，号为多士”，并进一步用儒家文化融合和化解西域不同文化，如南凉时期的“以儒化胡，文明以止”。“德化天下”这种现象和努力在封建王朝中一直发挥作用。“在漫长的王朝国家时代，政权的构成是多元的，既有占主导地位并且影响较大的中原王朝，也包括参与构建中国历史上边疆地区的王朝与政权”。^[18]（P49）中原王朝传统的治边思想、方略与制度包括“守中治边”“守在四夷”“远交近攻”“重根干轻枝叶”“德泽洽夷”“以夷制夷”等。^[18]（P100）总之，王朝国家治边方略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内容十分庞杂。

民族国家是继王朝国家之后的一种国家形态，这一变化也导致了政权对于边疆状态统治的变化。“《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疆域开始从传统王朝国家‘有疆无界’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转变”。^[19]而进入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阶段后，边疆关系从“中心—四夷”关系走向“中央—地方”关系，这对于高级治理的要求更加严格，必须根据民族国家的主权属性、国族属性、人民属性、政治属性等内容重新进行架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起点。其依据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在对边疆地区的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基础上开启了对边疆的治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全面的社会改革成为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通过这一社会改革支撑国家对边疆的治理，使得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彻底从传统中走出来，脱离了历史上的边疆治理窠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疆治理消灭了传统治理的剥削和压迫制度，建立起边疆地区各族人民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的“人民民主专政”，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样一来，边疆地区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得以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从古时的“管控”到近代的“建设”，再到当今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19]

同时，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的变迁，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还面临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工作面临的挑战更多了。”^[20]（P264）一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速度缓慢，少数民族数量多，文化差异较大，信仰多元复杂，人员流动复杂，使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面临极大挑战性。同时，边疆民族地区还是境外势力渗透的重点区域，“境内外敌对势力频频借民族宗教问题对我进行干扰渗透破坏”。^[21]（P165）二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落后制约了共同富裕的进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我国新阶段重要奋斗目标，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要求。我国民族地区多是边疆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三是民族边疆地区面临与对外开放相伴而来的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支持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特别是对口援疆和对口援藏制度、“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兴边富民行动等，这些都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但在这种背景下，边疆安全和边疆治理显得更为重要，机遇与风险并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多次召开涉及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会议，多次到边疆地区调研考察，就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治国必治边、新时代治藏和治疆基本方略等方面，集中回答了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

一系列问题，为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指明了方向。

此时，对照河西走廊的治理经验来看，较之于内地的发展，西北边疆地区还存在一定的贫困问题。虽然普遍来讲脱贫了，但尚未致富。这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只有将此解决了，一个安居乐业、人民富庶的社会将形成。事实上，历次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的建设，都在致力于此。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确定的共同富裕的方针则将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高铁、机场等现代交通设施的建设与工业、信息化产业的普及将使西北边疆地区在生产方式上发生重大变化。

最后则是文化建设。这是五凉经验最为宝贵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凉经验中的文化建设与习近平总书记就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相吻合，尤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路径一脉相承。他强调民族工作要多做争取人心的工作，强调努力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和情感归属。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要向培育、增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聚焦，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文化和信仰的力量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尤其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提升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诚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注 释]

- ①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阐述：“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西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
- ② 《后汉书》中载：“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融于是日往守萌，辞让巨鹿，图出河西。萌为言更始，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融大喜，即将家属而西。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窦融列传》，P796。
- ③ 据《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汉书·武帝记》，P44）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

- 政府“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汉书·武帝记》，P47）汉朝政府先后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通称河西四郡。
- ④ 该句出自汉代匈奴人创作的《匈奴歌》，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将兵出击匈奴，夺取焉支山和祁连山，匈奴人悲伤作此歌。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P124。
 - ⑤ 焉耆国是西域北道的大国之一，坐落在天山中部的焉耆盆地中。三国时就已兼并了附近的尉犁、危须、山国等国。西晋时，焉耆最为强大，葱岭（今新疆西南部）以东诸多小国都成了它的属国。盛时疆域方圆四百里，国内有九城。
 - ⑥ 龟兹国位于天山南麓，坐落于塔里木盆地之中。在历史长河中，龟兹是丝绸之路新疆段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道的重镇，宗教、文化、经济等极为发达，龟兹拥有比莫高窟历史更加久远的石窟艺术，它被现代石窟艺术家称作“第二个敦煌莫高窟”。龟兹人擅长音乐，龟兹乐舞发源于此。此外尚有冶铁业，闻名遐迩，西域许多国家的铁器多仰给于龟兹。

[参考文献]

- [1] [宋] 范曄. 后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赵向群. 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 [3] [东汉] 班固.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4]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5] [唐] 房玄龄等. 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 孟凡人. 新疆考古论集 [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

- [7] 司豪强. 战争与外交: 前凉对外关系研究 [D]. 兰州: 兰州大学, 2021.
- [8] [北魏] 崔鸿撰, [清] 汤球辑补. 十六国春秋辑补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 [9] [北齐] 魏收. 魏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0] 黎尚诚. 后凉史事述略——兼述氏族文化渊源 [J]. 天水师专学报, 1984, (2).
- [11] 徐柳凡. 五凉政权与河西地区农业的发展 [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2).
- [12]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3] 冯培红. 五凉的儒学与佛教——从石窟的早期功能谈起 [J]. 兰州学刊, 2006, (1).
- [14] 韩树伟, 马托弟. 李暠与西凉政权 [J].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7, (1).
- [15] 韩树伟. 论西凉政权及其在丝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
- [16] 齐陈骏, 陆庆丰, 郭锋. 五凉史略 [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8.
- [17] [唐] 道宣. 续高僧传 (卷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18] 周平等. 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 [19] 李大龙. 铁颜颜, “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中国疆域话语体系建构 [J]. 思想战线, 2020, (3).
- [20]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 [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9.
- [21]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精神辅导读本 [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21.
- [22] 习近平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EB/OL].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807/c40531-25421812.html>.

The Implications of Frontier Governance from the Five-Liang Period Experience

XU Zhao-shou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as mentioned by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pecifically, from which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s the major task nowadays, and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is the critical step in the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governance of Tibet,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is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in China, and the Hexi Corrid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gion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Therefore, it is useful to learn from the historical governance experience in Hexi Corridor, especially, during the Five-Liang period. This paper discusses every governor's experiences in the five-Liang period in Hexi Corridor, and based on thes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puts forward the three governance ways—the first-level governance, the middle-level governance and the superior governance,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belongs to the superior governance which is matched with the important thought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specially in accordance with his measure of “forging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improv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frontier governance.

[Key words] Five-Liang period experience; frontier governance of China; implication

(责任编辑 胡晓春/校对 谷雨)